

日本见闻略述

● 汪志平（自仪 02 班）

我因为在日本工作生活多年，所以对于日本的一些社会状况有所了解，也感悟颇多，下面分享一些我的见闻和思考。

日本的大学和大学教授

根据 2013 年度调查数据，日本全国有大学 782 所，其中东京都 139 所，大阪府 56 所，爱知县 52 所，兵库县 41 所，北海道 36 所，福冈县 34 所，京都府 33 所等。

日本的大学分为国立、公立和私立三种，国立 86 所，公立（都、道、府、县、市立）90 所，私立 606 所（占 77.5%）。

日本的大学教授共 5 万多人，平均每个大学只有 70 多名教授。而且，这一数据已经很久没有发生大幅度变化了。国立和公立大学的教授人数是固定的，如果没有开设新的专业，那么就只有当现任教授退休或辞职或跳槽到其他大学后，才能有教授岗位空席。而私立大学虽然没有明确固定，但是为了控制人力成本，教授的岗位也是非常紧俏，往往是数十人甚至上百人来竞争一个岗位。

相对来说，大学教授是日本高薪且稳定的职业之一。日本的大学教授年收入在 1000 万至 1200 万日元之间，因学校和地区略有不同；2010 年平均收入为 1128 万日元（当时合人民币约 78 万元），仅次于民航客机飞行员，排在日本全国所有职业平均年收入的第二位。一般来说，用大学教授 4 年的收入，可以在市内购买一块土地，建起一幢 2 层小楼；如果是买使用面积 100 平方米的公寓，2-3 年就差不多了。

媒体上经常看到有国内高校丑闻的报道，比如科研经费挪用和贪污，成果作假，师生性关系不正常等等。类似情况在日本的大学里是很难想象的。日本政府每年都将全国各职业的平均收入对社会公开，如此一来，高薪的大学教授就和政治家、大企

业家一样，成为社会舆论和媒体监督的焦点。一旦发现疑似贪腐的行为，各大媒体就会闻风而动、一拥而上，争先进行大密度报道，使事件成为全国皆知的话题。所以，日本的大学教授必须时刻保持清醒，因为社会对他们错误的容忍率接近于零。大学教授绝不敢轻易越雷池半步，否则就将面临身败名裂的危险。

2010 年 4 月，东京某有名私立大学的一份内部资料被公开到网络上，资料中包括该校十多年来教授谎报学历、抄袭论文、对女生性骚扰等事件的内部处理记录。虽然已经在内部严肃处理过，而且事件的数量也算不上惊人，但资料中的内容还是令日本社会感到惊诧。这一事件造成的直接后果，就是该大学的毕业生就业率下滑，学校名誉受到极大损害。

由于竞争激烈，一旦某个教授有不当行为，不仅是社会舆论，就连大学中的后辈都会盯着，甚至通过揭发罪行借机上位。

日本的高考制度要比中国更加多元化，入学渠道更多。日本的全国统一高考叫做“大学入学者选拔入试中心试验”，简称“中心试验”。考试科目类似于我们的“3+X”，在国语、数学、外语（可以选择包括汉语在内的 5 种外语）之外，还会根据文理科划分出不同的综合试卷。绝大多数国立和公立大学，如东京大学、京都大学、大阪大学、北海道大学等，都会根据“中心试验”的成绩来选拔参加各校自主命题考试的学生。

而大多数私立大学，如早稻田大学、庆应大学等，采取的是自主命题招生，考试内容也是五花八门，甚至一所大学内每一个学部（系）的考试要求都不相同。比如，庆应大学的部分学部会要求考生写小论文，而国际基督教大学则直接采用美国大学的试卷模式出题。最有趣的是共立女子大学，居然会进行“情商测试”，并作为重要的选拔标准。

近年来日本社会“少子高龄化”程度加深，很多私立大学出现生源匮乏的问题，全国600多所大学中有将近40%不能招满学生。这种现实再加上多元化的入学途径，如今想在日本读个大学是件很容易的事情。

日本的垃圾分类回收

日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垃圾分类回收，如今已经被认为是全球垃圾分类回收做得最好的国家。在日本，我每搬到一个新地方，必定会有该区域垃圾分类处理时间的图文介绍送过来，还是多语言版本的。日本几乎所有商品都有垃圾分类标识，比如一个饮料瓶，瓶盖、塑料标签、瓶身都会标明属于哪个种类，这样更有利于回收。

日本的垃圾回收，每个区都不太一样，但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：一类是可回收的资源垃圾，包括塑料容器包装、玻璃瓶、书本杂志等，基本上一周一次。第二类是可燃烧的生活垃圾，包括厨房产生的生活垃圾、无法再利用的纸屑纸巾等。这类垃圾比较多，一般一周收集2到3次，回收后通常焚烧处理。生活垃圾不允许前夜扔，怕被乌鸦叼散。如果睡懒觉起床晚了，垃圾车开走了，就得让垃圾在家里再臭上几天。所以我每到生活垃圾收集那天，就要注意早起些。如果起晚了听到垃圾车到来的声音，就匆忙出门去扔垃圾。第三类是不能燃烧的垃圾，包括灯泡、陶瓷等废弃且不可燃的生活用品，一般一个月一次。

此外，日本的超市有专门的统一回收点，回收泡沫容器、牛奶盒等，电器用品商店也有专门回收干电池的容器。另外，粗大垃圾和电器制品垃圾，是需要花钱专门处理的，随意抛弃属于违法行为，会被严厉处罚。

各类垃圾都必须按指定的日期扔到指定地点才能被回收处理。被弄错了分类的垃圾会被捡出来，贴上小纸条放在垃圾站不做回收。不好好做的话会被周围的人看不起，以“耻文化”为中心的日本人是一般不会在家门口做丢人的事。年轻人从小就看到大人做垃圾回收处理，耳濡目染养成了自觉分类垃圾的习惯。

毫不夸张地说，日本对垃圾分类处理的细致程度，是到了让人抓狂的境界。我现在所在大学的共用垃圾箱，有不可燃垃圾、玻璃瓶和铁罐、塑料瓶、

塑料制品、再生纸、咖啡渣和茶叶等含有水分的垃圾箱。还有书和杂志要扔的话，要用绳子把它们捆好。

就连垃圾袋都是政府指定，要花钱去店里买的。而且每个地方指定的垃圾袋都不一样。现在日本街道上几乎看不到垃圾桶，据说是为了防止犯罪分子放炸药。所以垃圾都要带回家扔，我现在已经养成了随身带着小塑料袋装垃圾的习惯。

日本的公民文化与社区建设

日本社区的组织化程度很高，居民具有浓厚的社区意识并且积极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。在诸多的社区自治组织中，“町内会”可谓独具特色。在日本，町是构成社区的最小单位，类似于中国的街道。除少量的单身户以及频繁搬迁的家庭外，町里的绝大多数家庭都会加入町内会，并且交纳一定的会费。居民从会员中选举出会长、会计以及小组组长来负责町内会的日常组织和管理。

町内会集多种功能于一身。社区的公共活动大多数是以町内会为单位举办。町内会不仅负责筹办节庆祭祀，而且经常组织一些具有吸引力的文体活动，如敬老会、茶道会、棒球赛，为居民提供交流的渠道，促进邻里交往和相互了解，满足居民的精神生活需求。在突发事件以及自然灾害的预防与应对方面，町内会担负起对居民进行防灾培训的工作，并且组织居民共同抵御灾害以及负责救灾物资的分配，培养社区居民同舟共济、互帮互助的意识，提高社区的凝聚力。此外，町内会的工作内容还包括：协调社区中老年人会、妇女会、中小学生会以及各种文体组织和志愿者团体之间的关系，为居民提供保健服务，美化社区环境，维护社区设施，预防犯罪。由于町内会兼具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与行政管理组织的双重特性，因此在社区运作以及与政府行政部门的互动中，町内会扮演着上传下达的角色。

日本每个大大小小的社区通常都有公民馆。公民馆的建造和修缮费用一般来源于社区居民的筹资、捐款以及政府的专项经费。每个公民馆都设有事务局来处理馆内的日常事务。事务局的工作人员除了一小部分是专职人员外，大部分是社区居民自愿义务兼职的。

公民馆的一个主要功能是给社区居民提供交流、学习、娱乐、休闲的场所和设施。馆内常设会

议室和厨房，社区居民可以在这里聚会、聚餐。老人们可以在馆内下棋、锻炼，家庭主妇可以在馆内切磋厨艺，孩子们可以在馆内学习。社区居民组织的文艺团体（如合唱团、舞蹈队）也可以在公民馆排练和演出。

公民馆开展活动的内容多元而且非常实用，比如为家庭主妇举办幼儿教育、烹饪、插花讲座，为一些爱好绘画、音乐、手工的居民提供培训，为外国居民开设日语学习班。在诸多的社区活动中，一年一度的社区祭可谓是一项全民事务，町里的男女老少皆参与其中，町里的公司和学校也全力配合。

在社区祭筹备以及正式举办的过程中，居民根

据自己的性别、年龄等扮演着不同的角色。那些平时因工作忙碌而很少往来的男人们会抽出时间到公民馆聚会，大家一起出谋划策，商讨祭祀的细节工作。妇女会的成员们则担负起后勤任务，为参加聚会和祭祀活动的人准备餐食。在祭祀庆典当天，社区居民会穿上节日服装，佩戴象征自己町颜色的彩带，参与社区游行，为自己的町呐喊助威。整个社区祭是一个全民参与、全民联欢的活动。这一共同的社区事业将居民组织到一起。居民间的分工协作和沟通，加强了邻里之间的团结，提高了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共同体意识。^[80]



毕业后的人生轨迹

198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，同年考取经管学院出国预备研究生，1986年赴日留学。1990年在福岛大学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，1993年在北海道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。

1993～1995年任北海道大学经济学部助理教授，1995～1997年任札幌大学经营学部专任讲师，1997～2002年任札幌大学经营学部副教授，2002年任札幌大学经营学部教授至今。

主要研究方向：日本的企业制度和金融制度；中国的企业改革；公司治理制度的日本、美国和中国的比较。日本证券经济学会干事，日本中国经济经营学会会员。

主要著作：（日文）《日本巨大企业的行为方式》，北海道大学出版社，1995年；《中国的股份公司和证券市场的形成》（合著），日本证券经济研究所出版社，1994年；《最新现代企业论》（合著），八千代出版社，2001年；《企业形态要论》，中央经济社，2001年；《企业论入门》，中央经济社，2007年；《公司治理的国际比较》（合著），税务经理协会出版社，2007年；《现代经营学》（合著），学文社，2008年；《企业论》，中央经济社，2015年。

（中文）《日本金融机构的组织和管理》，上海远东出版社，1997年；《二十一世纪中国发展建议书》（合著，编委），经济科学出版社，1998年；《现代日本工商管理案例》（合著，副主编）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1999年。